

血液的「曖昧線」

——台灣皇民化文學中「血」的表象與日本近代 優生學論述*

吳佩珍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明治初期，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日本人開始提倡「人種改革」，例如透過不同人種間的通婚以改善日本人種劣等性的論述便在此一時期形成。但是歷經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以及日俄戰爭(1904-1905)後，日本的優生學論述開始改變方向。在贏得兩場戰爭的勝利之後，日本人已是當時最優秀的人種之一的相關論述在日本開始流行，並為當時日本的優生學論述帶來變化。日本近代以來隨著不同時期而產生多樣化的優生學論述的演進實際上對於日本帝國殖民地統治政策有極重大的影響。

以台灣為例，皇民化時期日本的優生學論述與在殖民地所實施的同化政策間所出現的矛盾可由日台作家作品對立的分歧窺見，而這在一九四〇年代台灣的「皇民文學」中描寫「血統」問題的作品尤為明顯。本文的目的將透過爬梳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形成的歷史脈絡，檢視關於「血液」論述的變遷以及一九四〇年代台灣「皇民化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同化政策與優生學論述二者間的矛盾與衝突。此外並更進一步突顯日本近代優生學「純血」論述在日本帝

* 本文乃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日本帝國（殖民）文學中「血」的表象與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96-2411-H-031-012-）的部份研究成果。另，對二位審查人於審查過程所提供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國擴張時期複雜及多層的面貌以及其對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如何扮演推波助瀾的意識型態角色。

關鍵字：近代日本、優生學論述、皇民化文學、同化政策



The Boundary of the “Blood”:

The Representative of “Bloo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Imperial Subjective and the Eugenic Discourse in Modern Japan

Wu, Pe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Graduated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arwinism, Japanese began to advocate “reforming the Japanese race.” In this stage, the discourse to improve the inferiority of Japanese race through the inter-racial marriages had been formed. However,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Japanese eugenic discourse approached to a turning point. Japanese race was supposed to be one of the superior races becomes popular and indicates the changes of the racial discourse. In fact, the discourses on Japanese eugenics developed in various form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modern Japan which also brought the huge influences to the colonial ruling policy.

Using Taiwan as an examp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Japanese eugenic discourse in the Imperial Subjective period and the policy of national assimilation in colony could be seen in the conflicts among the Japanese writers’ works and those of Taiwanese writers. The characteristic is obvious in the works which stress on the “blood” issue in Taiwan’s Imperial Subjective literature in 1940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ood” discours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nflicts in Taiwan’s Imperial Subjective literature in 1940s through put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eugenic discourse in modern Japan in order. Moreover, to shed light on how the complicated and the multi-

layers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pure blood” ensured the validity when Japanese empire broadened its territory and advanced to overseas is another purpose of this paper.

Keywords: Modern Japan, the Eugenic Discourse, the Imperial Subjective
Literature, the Policy of National Assimilation



血液的「曖昧線」

——台灣皇民化文學中「血」的表象與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

一、序論

明治初期，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日本人開始提倡「人種改革」，例如透過不同人種間的通婚以改善日本人種劣等性的論述便在此一時期形成。但是歷經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以及日俄戰爭（1904-1905）後，日本的優生學論述開始改變方向。在贏得兩場戰爭的勝利之後，日本人已是當時最優秀的人種之一的相關論述在日本開始流行，並為當時日本的優生學論述帶來變化。最顯著的，即是日俄戰爭前後在西歐諸國「黃禍」論述的形成對日本的優生學論述所產生的影響。¹

然而進入大正期之後，在德國優生學的影響之下，維持日本優秀人種的「純正」血統的必要性，絕對不可與其他「劣等」種族混血的主張也開始出現。²

日本近代以來隨著不同時期而產生多樣化的優生學論述的演進實際上對於日本帝國殖民地統治政策有極重大的影響。以台灣為例，皇民化時期日本的優生學論述與在殖民地所實施的同化政策間所出現的矛盾可由日台作家作品對立的分歧窺見，而這在1940年代台灣的「皇民文學」中描寫「血統」問題的作

1 「黃禍論」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世界政策」上為規避與歐洲諸國產生對立所擬出的方策。在寫給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他於1891年時在訪日時發生大津事件因而負傷）的信中提到：「我對於你發起對抗日本以維護歐洲利益共同行動的智舉，衷心感謝」（1895年4月26日）。日俄戰爭前逐漸形成的「黃禍論」論述以及戰後日本「人種優秀論」的高揚在日本優生學論述形成的過程當中所產生的影響明顯可見。市野川容孝，〈黃禍論と優生学——第一次大戦前後のバイオポリティクス〉，《編成される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2.03）。

2 關於德國保持血統純正與民族主義高張的關係，可由華格納利用日耳曼神話，發現日耳曼民族永久不滅的真理唯有透維持血統純潔才能持續一例看出。而日本大正期乃至到1940年代優生學論述深受德國思潮影響，也是日本民族純血論論述的逐漸形成時期，這顯然與前述的德國日耳曼民族純血論有密切關係。ジョージ・モッセ，《大衆の国民化——ナチズムに至る政治シンボルと大衆文化》（日本東京：柏書房，1995），頁111-112。

品尤為明顯。內地人作家當中，如坂口禰子以及庄司總一企圖透過日台「混血兒」的形象以強調當時台日關係的融合，而同時期的台灣人作家中，例如陳火泉以及王昶雄小說中的主人公們，雖然希望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但另一方面卻為自己「非日本人血統」的問題而苦惱。日台作家對混血兒以及「被殖民者」的描寫都圍繞在「非日本人血統」，突顯台日混血兒以及力圖成為忠誠「皇民」的台灣人身處身份認同（即日本人）與「血統」（非日本人種或「不純」的混血血統）之間不一致的齟齬而身陷進退兩難的境地。

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對於殖民地統治政策的影響，較重要的先行研究如下。小熊英二《單一民族起源の神話》³是以歷史觀點來陳述日本優生學以及台灣、朝鮮殖民地同化政策間的矛盾與衝突，而小熊的《日本人の境界》（1998）以及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1996）則針對〈同化政策〉以及〈血緣〉論述之間的關係提供概略的輪廓。在文化人類學領域中，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則提到了混血、優生學論述以及皇民化的關係，特別是他提及當時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的文化人類學者・金關丈夫曾主張以混血論達成同化目的的事實，更呈現當時內地的優生學論述與殖民地統治政策之一環——〈同化政策〉二者間認知的差距⁴。在優生學論述方面，藤野豐的日本被差別部落以及漢生病研究延長線上的《日本ファシズムと優生思想》（1998）將日本近代優生學發展史以及其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共犯關係做出系統性的整理。在台灣殖民文學方面，星名宏修在〈『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化期文学』を読む〉⁵（2001.03）聚焦於皇民化時期的優生學政策與皇民化文學，論述了皇民化時期文學中為非「純正日本血統」所苦的台灣知識份子的形象。〈植民地の「混血児」——「内台結婚」の政治学〉（2002）一文指出「混血児」的血液成了「皇民化以及優生学論述相互鬥爭の『舞台』」，並以

3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起源の神話》（日本東京：新曜社，2002再版）。

4 坂野徹，〈漢化・日本化・文明化——植民地統治下台における人類学研究〉，《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日本東京：勁草書房，2005.04），頁226。但坂野同時認為，當時以混血或者是優生政策觀點來討論皇民化者，只有金關此一觀點。

5 同時參照中譯版本，星名宏修著、莫素微譯，〈「血液」の政治学——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台灣文學學報》6期（2005.02）。

庄司總一《陳夫人》以及坂口禰子〈時計草〉中台日通婚所誕生的混血兒表象為論證焦點。《陳夫人》中的混血兒清子對於自己「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星名認為與「否定自我『台灣人』血液以及摸索成為『皇民』／日本人手段」（頁274）的皇民化世代成為對比，並成為《陳夫人》的獨特之處。此外並指出〈時計草〉中的混血兒主人公「純」對「體內所流的『高砂族的血』」（頁284）的自覺，是繼承了父親玄太郎企圖透過與「高砂族」通婚以便達成「民族政策」的志業。即使如此，星名認為這些混血兒形象是「證明日本人的優越性以及大東亞戰爭的正當性的活生生的證人」（頁290），並為殖民者的統治政策所回收。此論文解明了當時文學作品中部分的「混血兒」表象問題。

但以上的先行研究，對日本人作家與台灣人作家在各自的作品當中所呈現的對同化政策的主張與身份認同、「血液」論述的結構問題之間所出現的矛盾與衝突，以及圍繞著「血液」與身分認同關係的解釋權所進行攻防的論點，並未深入探討。日本人作家與台灣人作家對於「身分認同」與「血液」論述認知的落差與日本近代化以來優生學論述的生成變遷，以及隨著帝國膨脹擴張而產生的殖民統治政策，其實有著相生相剋的關係。姑且不論台人作家與日人作家是否意識到彼此的落差乃是優生學論述的生成變遷以及殖民統治政策二者相生相剋的產物，二者認知的落差在皇民化時期所建構的書寫中所呈現的差異成了二者論述攻防的焦點所在，而二者論述差異的交鋒卻也揭露了「皇民化政策」的欺瞞與破綻。

本文的目的將透過爬梳日本近代優生學論述形成的歷史脈絡，檢視關於「血液」論述的變遷，並以一九四〇年代台灣「皇民化文學」作品中日本作家作品：庄司總一《陳夫人》以及坂口禰子〈時計草〉以及台灣人作家作品：陳火泉的〈道〉以及王昶雄的〈奔流〉為分析文本，以解明一九四〇年代台灣「皇民化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同化政策與優生學論述二者間的矛盾與衝突。⁶

6 皇民化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日本人作家的作品中庄司總一《陳夫人》以及坂口禰子〈時計草〉強烈地呈現優生學論述中的純血信仰，而台灣人作家當中，雖然周金波的〈志願兵〉被視為是「血液」論述的典型文本，但強烈地質疑優生學立場的「純血」信仰者，則以陳火泉所的〈道〉以及王昶雄的〈奔流〉較為典型，故本文以此四個文本為例，進行分析。

此外並更進一步突顯日本近代優生學「純血」論述在日本帝國擴張時期複雜及多層的面貌以及其對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如何扮演推波助瀾的意識型態角色。

二、日本優生學論述的受容變化與日本帝國的擴張

根據藤野豐的分類主張，日本戰前優生學論述發展大致可區分如下：

第一期，明治維新～日俄戰爭期間：優生學思想隨著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起進入日本，其中知識份子對於代表對抗歐美人種的「人種改良論」最為關心。

第二期，日俄戰爭結束後期：對俄國戰爭的勝利及之後因帝國主義的對立以及歐美的黃禍論高張，日本對於優生學論述逐漸正視。

第三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二〇年代前期：一次大戰之後為整備國家總體戰體制，對於提高日本民族人種品質開始有了具體的論述，關於「斷種法」施行可否也展開積極論證。另一方面，廢娼運動、女性運動、節育運動等社會運動當中，與優生思想產生共鳴者亦不在少數。

第四期，一九二〇年代後期～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日本醫師會以及日本紅十字協會開始積極推廣優生學，日本民族衛生學會等的成立逐漸使大眾接受優生學思想，而政府也逐漸認識優生政策的必要性。

第五期，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滿洲事變後，日本逐漸進入法西斯體制，其間受到納粹立法的影響，斷種法案進入議會議程當中，優生政策進入實行階段。

第六期，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法西斯體制確立，「國民優生法」以及「國民體力法」成立，國家對國民健康以及生命的統制形成。同時更進一步地企圖達到國家對於結婚的統制管理，後因日本敗戰未能成為完全實行。⁷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優生學東漸，各個階段各有因應時代背景以及國策需求所產生的優生學論述。最早期如福澤諭吉者，認為人種改良方法除了可透過與歐美人種通婚，甚至為圖「快速繁殖」，主張可嘗試「一夫多妻」或者

7 藤野豐，《日本ファシズムと優生思想》（日本京都：かもがわ出版，1998.04），頁49-50。

「一妻多夫」。⁸而在經過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之後的優生學變化，如海野幸德的《日本人種改造論》（1910），便認為「目前能夠躍升一等國家的黃色人種獨我日本耳」。由上述當代的論述得知，此時期日本優秀人種論主張數種人種的混合以達成優生目的。例如日本東京大學人類學者坪井正五郎在1908年〈日本人種の起源〉演講中，敘述日本人種當中有類似朝鮮地方者，有與馬來地方者相似的，也有與愛奴相似者，並提出當代日本人是這些人種混合而成。⁹

但是大正期（1911-1924）之後，「純血」論述逐漸抬頭：「以擁有優秀的祖先為榮，同時對代代皆有身心兼優人物這樣的遺傳基因必須引以為傲。只要自重優良遺傳因子，便會自然延續其遺傳的系譜，同時預防混入劣等血統」。¹⁰由上記引文可得知純血論論述在此時期正開始漸漸地普及。

在一九二〇年代時，日本優生學運動更加蓬勃，優生學相關雜誌陸續創刊。1924年1月後藤龍吉創立日本優生學學會，創辦會誌《ユーゼニックス》（1925年3月起更改誌名為《優生學》，於1943年4月廢刊）。此外，日本優生運動協會創立者池田林儀於1926年11月創立會誌《優生運動》，發行至1930年1月止。在這之前的優生運動僅流行於少數學者之間，在一九二〇年代後期，節育概念與優生思想結合後，優生運動開始成為議論的焦點，而後藤及池田也將此種優生思想普及於當時民眾的意識之中。比起後藤，池田對於民眾更有影響力。因為池田不僅出版《優生運動》，而且透過他的「足之會」等事業，與民眾有更多接觸的機會。¹¹他曾擔任《報知新聞》派駐柏林的記者，之後進入柏林大學攻讀優生學，在同一大學以及羅斯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所提倡的優生學運動分為「建設性運動」以及「限制性運動」兩種，「建設性運動」提倡

8 福沢諭吉，〈人種改良〉，《福翁百話》（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59）。

9 坂野徹，〈人種・民族・日本人——前日本の人類学と人種概念〉竹沢泰子編《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日本京都：人文書院，2005），頁234。

10 山内繁雄，〈人類の遺伝〉（日本：大日本學術協會，1917），〈性と生殖の人権問題資料集成 優生問題・人口政策編 16卷〉（日本東京：不二出版，2000），頁235。

11 同註6，頁80-81。

「提高優生者的結婚率」，後者則意圖「減少劣生者的結婚率」。¹²

此時期，池田認為「民族」是由「單一血統」者所構成。他主張「血統無法欺瞞……日本人就得活得像日本人。日本人對於自己本身的血統無法欺瞞。血統也無法因國籍或生活方式而改變」。¹³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對外拓展，支持帝國膨脹的人種論述主張，卻與上述的純血論論述相互矛盾。「日本人的血也許是美好的。但是如同同族通婚的弊病，現在我們可見很多同族通婚的惡果。難道沒有能夠徹底拋棄島民劣根性，讓民族朝向世界政策發展跨出第一步的先知者嗎？首先應該公開允許讓台灣，朝鮮以及南洋殖民地官吏與當地的女性結婚，讓朝鮮以及台灣的內地人捨去不必要的自尊，這便是民族發展的第一步」。¹⁴

由上述引文可知，如水島所主張的「混合民族論」論述是針對帝國版圖的拓展以及殖民地統治政策的需求下而發展的。對於「殖民地政策」發展而言，「混合民族論」可說是支持當時台灣以及朝鮮半島殖民地統治政策論述的主流。反之，「純血論」則成為拓展「殖民地政策」的阻礙。

由上述，我們可發現優生學自引進日本的明治初期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代，這之間的演進以及明顯的變化。明治期的優生學論述顯然地以「人種」改良為前提，而進到大正期，已漸漸與「民族」一語癒合。此一變化顯然受德國「Rassenhygiene」（Race hygiene，人種／民族衛生學）概念的影響。Sheila Faith Schneider指出Rassenhygiene一詞比起英語eugenics的範圍更廣，不僅「其目標在於企圖『增進』人口的遺傳品質」，也成為「人口提升的完全指標」。¹⁵由於此時德國「Rassenhygiene」概念的滲透，優生學所提倡的日本國民改良已由「人種」轉為「民族」為單位的考量，由上述池田的「民族根性的主張」以及水島「混合民族論」已可明顯看出其變化，而之後成為日本優生運動中心組織的

12 此處的運動主張可見同時期德國優生學者Wilhelm Scallmayer所主張的高級官僚以及教師應早婚，以及優生者應提高出生率論述的影響。Sheila Faith Schneider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1904-1945"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8-21.

13 池田林儀，〈民族根性の擁護〉，《優生運動》3卷5号（1927.04），頁21。

14 水島水一郎，〈土人娘の胎内よりする民族發展策〉，《優生運動》2卷2号（1926.02），頁19。

15 Sheila Faith Schneider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1904-1945", p.8.

「民族衛生學會」於1930年成立，便可知日本優生學運動已經由「人種」遺傳基因改良進入提倡提升「民族純粹度」的階段。

1939年日本成立厚生省，與優生勢力相輔相成，1940年通過了對遺傳病患者施行斷種措施合法化的「國民優生法」，以及由國家管理，提倡增進體力的「國民體力法」。此時期擔任日本民族衛生學會副會長的古屋芳雄抨擊為支持達成民族同化目的的結婚政策所散佈的「混合民族論」。此外他也強調混血兒問題，在不牴觸皇民化的範圍內，主張應該避免「混血」。¹⁶

古屋所主張的「混血忌諱」，在當時的新聞媒體可見其延伸論述，如「混血兒劣等論」。例如慶應大學解剖學教授谷口虎年指出：「眾所皆知的，德意志為了保有「日爾曼的純血」，其政治立場是嚴禁與其他種族通婚的……混血兒比起雙親的人種更易受結核菌侵襲……混血的不調和也影響了心理，所以也多見低能者以及犯罪者」。¹⁷此篇報導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軍隊進駐本國，結果與德國人以及法國人之間產生了許多黑白混血兒為例，並以此為戒，警告日本正在進行的海外戰爭可能產生大量混血兒。雖然作者指出「混血的結果孰善孰惡，不得而知，有待今後研究的結果」，但文中後半的內容以美國獨立戰爭時混血兒傷兵受傷死亡率高為例，隱然影射混血兒生理方面易有缺陷。¹⁸

岡徹對於與東亞各區域通婚混血，提出下列的意見：「（大和民族）……是長久以來居住於日本列島渾然而成為一種族，並且被認為是根據遺傳的法則中的隔離法所形成的優秀種族。無論如何都絕不可喪失其優越性。（中略）與東亞民族血緣過近，其並非有合宜的強勢，所以即使必須與其鞏固親善關係，但是須知並不獎勵與之通婚」。¹⁹日本在三〇年代後期以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為目標，除了台灣以及朝鮮等殖民地之外，並建立了滿洲國並開始入據中國大

16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起源的神話》，頁251-252。

17 谷口虎年，〈大陸日本の進出に登場するこの問題—異人種との結婚と混血児 その結果はどんなものでせう〉，《読売新聞》，1939.04.24，朝刊5面。

18 實際上，德國在1937年對385名黑白混血兒實行了斷種的手術，反映了「混血兒」的人種劣勢論述自有其影響。Sheila Faith Schneider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1904-1945” . p.47.

19 岡徹（談），〈共榮圈内の結婚優生的にどうか〉，《読売新聞》，1940.10.08，朝刊4面。

陸。但是雖然一方面打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同化主義式口號，但另一方面在納粹的優生論述影響之下，「反對通婚」及「維持純正血統」的優生學說勢力高張趨勢可從當時媒體報導看出。

「純血論」以及「通婚忌諱」的論述在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到四〇年代隱然成為當時日本內部的優生學學說主流。一九四三年由厚生大臣下令，由厚生省研究所人口民族部製作的《大和民族を中核とする世界政策の検討》（以大和民族為中心的世界政策檢討）可看出當時的日本政府優生學說的中心思想。這份資料反覆強調應該防止混血發生，並指出與日本勢力所及區域的民族混血在優生學上是極為不利的。在提到大東亞共榮圈中對於「人口配置問題」明確指出「身為指導者的日本在這些國家內部為維持其指導勢力以及對抗敵對國家的妨礙工作，必須充份地移植大和民族的血至這些土地上」。²⁰同樣地在「混血問題」上，一開宗明義便重複同樣的論述。「我大和民族現今正流著『血』企圖達成大東亞共榮圈世界史的使命。為實現亞洲十億民族的解放，更為了維持東亞共榮圈指導的地位，我們必須將大和民族的「血」植入這些土地」。²¹很明顯地，避免大和民族與其他民族通婚的強烈主張正說明了在殖民地統治政策中殖民者應維持純正血統的「純血論」成為當時優生學論述主流。²²

Chung指出殖民地動員的實際需求以及「純正」日本人身分認同焦慮的情況下所形成的優生學論述，在日本政府以及優生學者操弄下，成為為殖民統治政策背書的弔詭正論。Chung主張當時以日本帝國為主軸的大東亞共榮圈，可以視為是分為三等分的同心圓。中間核心為代表萬世一系的天皇，中間圓部分則是以線性發展的家父長制為支柱的大和民族，而最外圍部分則為以文化連結的泛亞洲主義以及以領土連結的殖民地。各個領域間的界線同時存在的不同差異便是：血液／文化，質／量，內／外。Chung更進一步指出厚生省人口政策中優生

20 厚生省人口民族部編，〈第一篇總說〉，《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資料：戰時下に於ける厚生省研究部人口民族部資料 第三卷》（日本東京：文生書院，1981-1982），頁303。

21 厚生省人口民族部編，〈第二分冊第三篇 世界各国の民族事情〉，《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資料：戰時下に於ける厚生省研究部人口民族部資料》（日本東京：文生書院，1981-1982），頁2300。

22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起源の神話〉，頁253-257。

學者的功能便是保衛各個圓圈領域的自我／他者，內部／外部，血緣／文化以及質／量彼此間不越雷池一步。²³

隨著戰爭白熱化，成為支持台灣以及朝鮮統治政策以及動員殖民地人民的主要政策的「同化主義」與日本厚生省人口政策所代表的內部主張「純血論」的相克，成為統治者邏輯論述上最大的矛盾。在台灣，優生思想以及同化政策的相克，在1938年志願兵制度實施之後更加熾烈。而台灣皇民化運動期的文學作品正成為「優生學論述」以及「皇民化政策」互相角力的力學磁場。

三、皇民化時期文學與優生學論述的相克—— 「純血論」與同化政策間的乖離

日本明治文明開化期間，日本近代二大文豪森鷗外以及夏目漱石在反映其各自歐洲留學經驗的創作都描述了當時日本人遭遇異人種時的對應關係。森鷗外留德三部曲之一的〈舞姬〉（1890），²⁴其中主人公太田豐太郎拋棄了已懷有身孕的德國少女愛麗絲——愛麗絲因得知豐田即將離開自己獨自返回日本因而發狂。這部描繪異人種戀愛關係的文學作品為明治初期浪漫主義文學醞釀了濃郁的異國香氣，但對於日德混血兒論述的空白卻吊詭地透露了對「混血人種」的隱約恐懼。

而夏目漱石在英國留學期間，為在日本瀕死的摯友正岡子規寫下〈倫敦消息〉（1901），報告自己在倫敦留學生活的點滴，當中曾經敘述因日本人種身材矮小的自卑以及身為黃色人種而遭歧視的不平等待遇。漱石雖以自我解嘲的方式帶過，但仍由個人經驗反觀世界潮流與人種階級，顯現白人帝國主義擴張

23 Yuehtsen Juliette Chung.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2.04) pp.151-152.

24 森鷗外（1862-1922）自德國留學歸國後，連續發表以留學德國期間的見聞為題材的小說〈舞姬〉（1890年1月），〈泡沫記（うたかたの記）〉（1890.08），以及〈送信者（文づかひ）〉（1891.01），被喻為森鷗外的留德三部曲。平川佑弘指出，被視為〈舞姬〉續作的〈普請中〉（1911）與匈牙利劇作家Lengyel的人種問題劇《颱風》（Taifun, 1909）有著時代共時性關係。同樣描寫異人種間戀愛《颱風》以及〈普請中〉，與其說二者矚目異人種戀愛問題，不如說是「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的對決劇。平川佑弘，《和魂洋才の系譜》（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6），頁249-278。

正壓迫有色人種的世界局勢。提及「俄國與日本的戰爭前兆漸顯」，「中國天子蒙塵」以及「英國意圖挖掘特然斯瓦爾（Transvaal）的鑽石填補軍事費用的虧損」的例子，並將這樣的世界局勢與個人關係比喻為正如「日夜不停迴轉的大波瀾」以及「我輩所居之處也有著小迴旋以及小波瀾」。進而對子規宣稱將與欺侮自己的白人房東一決雌雄的決心。²⁵

另外，在明治維新中遭「薩長政權」討伐因而「亡國」的原會津藩士東海散士（柴四朗），在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1891-1897）中，描寫白種人與黃種人的「弱小民族」連帶關係，是為當時烏托邦無政府主義的理想表徵，而其中中國人以及日本人的連帶關係，令人聯想起之後宮崎滔天等自由民權運動的敗者協助孫文參與中國革命的超越種族的連帶關係。²⁶

明治期文學中反映的「人種」概念，某種程度反映當代優生學論述的主流價值，也就是對混血與人種的多樣性，以及異人種間連帶關係的想像。大正期優生學概念普及以及「大和民族」的純潔強化運動之後，對於保持血統的「純淨」觀念，可說是在日本才開始落地生根。特別是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的1937年以降，文學作品中的「混血兒」表象，多為強化帝國「大和民族」純血的單一性或是反為強調「興亞協和」的「大東亞共榮圈」形象所收編。1943年芥川賞得獎作品〈纏足時刻〉（纏足の頃），²⁷以蒙古人以及中國人通婚為主題，描述中國人以及蒙古人之間的混血兒。作品中描寫已失去游牧民族優勢的蒙古人，不得不依附在中國社會制度下生存，而為了謀求生存的解決之道，而「與支那人通婚，讓自己的子孫幾代之後，其血統同能夠升格與支那人同等」。²⁸此作品雖然以中國人以及蒙古人通婚為主題，但是其中對於血統純正的重要性以及統治者以及被統治者之間血統的序列關係的描寫，可看出當代優生學論述的影響與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的人口政策，²⁹而這也與同時代台灣的

25 夏目漱石，〈倫敦消息〉，《夏目漱石集》（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4），頁256。

26 日野龍夫等編，《政治小説集 二》（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6）。

27 作者石塚喜久三，1940年遠赴蒙古，此作品發表於1943年1月《蒙疆文學》並於同年獲得芥川獎。

28 石塚喜久三，〈纏足の頃〉，《芥川賞選集 三》（日本東京：文藝春秋社，1982），頁179。

29 厚生省人口民族部編，〈第二分冊第三篇 世界各國の民族事情〉，《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資料：時下に於ける厚生省研究部人口民族部資料》。

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中日本人作家作品有共通之處。

此時期台灣的日本人作家對當時的優生學學說中的「純血」論述有著強烈信仰者，同時對於「血統」問題特別著墨的作品，如庄司總一《陳夫人》（1940-42年）³⁰以及坂口禰子的〈時計草〉（1942年2月），二者皆為描寫台日通婚以及「混血兒」問題的作品。而如對照日本當代的優生學論述與這兩部作品，便會發現當代優生學論述如何形成這些作品「純血」信仰的基本論調。

前行研究中對於《陳夫人》「血」的議題研究大都將焦點置於主角陳清文及日本妻子安子之間所生的混血兒「清子」。但如從清文之弟瑞文其平埔族出身的妾陳氏陣的「血統」問題的描寫，當代日本優生學論述中「血」的優劣順序與人種論述之間的膠著關係則更清楚可見。

陳瑞文在被毒蛇攻擊之後，為陳氏陣所救，之後便愛上她。瑞文對於自己愛上「蕃人」女性一事，陷入自我嫌惡。但對於陳氏陣的「紅色的頭髮」以及「白色肌膚」的身體特徵，瑞文開始懷疑此部落是否混入了荷蘭人的血統。在陳氏陣的部落發現了為鄭成功所打敗的荷蘭人曾經與部落的女性通婚的證據資料時，陳瑞文的反應是：「陣的身體裏只要流著白人的血——就算是大海中的一滴——也就足夠了……只要如此，就能將他與蕃女發生關係的屈辱感中解救出來。會如此執著於血的問題也是因為對初次犯下的錯誤，有著極端的厭惡感」（《陳夫人》，頁236）。這樣的描寫，明白地顯示了當時「血」的優劣序列。陣的身體只要有著「就算是大海中的一滴」的白人的「血」，那麼與自己有了關係的，就不算是「野蠻」蕃女。荷蘭人白色人種的血液序列高於漢人以及原住民甚至是黃色人種的迷思，是日本明治維新近代化之後人種改良論的底流。即使1940年代日本優生學論述高唱日本大和民族「純血論」意識型態，近代日本一直以來意圖擺脫黃色人種對白色人種的劣等感仍在此處顯露無遺。

此外當代優生學「混血兒」的劣勢遺傳說也可見於《陳夫人》中陳清文與

30 庄司總一，《陳夫人》的第一部〈夫婦〉發表於1940年，第二部〈親子〉則發表於1942年，在1944年改編為單行本重新出版。這個作品在1943年入選為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賞作品。清水宏子，〈解説『陳夫人』〉，《リバイバル〈外地〉文学選集 20卷》（日本東京：大空社，2000）。

安子的混血女兒清子的形塑。對於清子雖有「台灣人」自我認同的自覺描寫，但是對於混血兒清子的表象，明顯地顯現出當時優生學所主張的「混血兒」欠缺。身體孱弱的清子，由於經常缺席體育課，因而引起老師以及同學的不滿。

「而清子自己認為——自份的身體是不適合像台灣這樣炎熱的地方的……自己對於這塊自己所出生的殖民地，為何有著異常的反感，其中的原因之一應該是來自生理上的原因」（頁241）。這段描寫不僅暗示混血兒清子的體質纖弱，同時與「內地人」相近，也由於生理上不可抗力的因素使得清子強烈地認為自己的「血統」是接近「內地」。

此外，清子的母親安子對於清子與台灣人表哥明的婚事「是無法寬容地接受。這是無法抗拒的血的命令……由於與本島人的結合，一想到自己日本人的血變得更加稀薄，而如果就這樣消失的話，不覺感到一陣惆悵。這是對丈夫清文也不能表明，不，甚至連對自己也不能輕易開啟的唯一秘密的盒子。」（頁308）。這段關於安子對「純正血統」想像的描寫中，隱藏著日本殖民者對「非大和民族」純正血統者的「純血優越感」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成為血統上的差異並無法透過台日通婚抹消的隱喻。而這段安子內心的隱憂描寫與當時對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通婚的論述如出一轍。安子對「日本」血統「純粹性」的想法，不僅反映了當時優生學論述的中心思想，同時也透露了當時日本「純血論」論述滲透狀況的訊息。

然而優生學論述與包含台日通婚的殖民地同化政策的乖離，在當時訪台的官員的主張也可看出。與《陳夫人》發表的同年1940年5月，開拓省首相小磯視察台灣時表示，離內台融合的目標還很遠，並表示「為徹底內台同化，只有同化血緣。有諺為：『血濃於水』。內島人以及台灣人無法融洽的原因是因為血緣相異的關係。選拔本島人的優良女性讓她們留學內地，提高她們的教養，消除障礙，讓血緣混而為一，那便會到達內台如一的境地了」。³¹ 這段談話雖然是針對當時同化政策而發，但是由問題的另一個層面來看，可知當時日本內

31 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 昭和篇（上）》（日本東京：田畑書店，2001.10），頁125。

部認為殖民地同化政策是支持通婚混血的，同時也呈現同化障礙的問題在於「血」的差異。

也因此一方面雖然「純血論」已成為日本當時優生學論述的主流，但由語言以及文化面企圖改造台灣人成為優秀「日本皇民」的「同化政策」論述，其實是陷入相互矛盾的境地。也因此《陳夫人》結局以形而上的「愛」來回收「純血論」以及「同化政策」之間的矛盾，與當時以「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統馭亞洲諸「黃色人種」民族，而抹煞所有「差異」的方法論有異曲同工之妙。³²

同時代對於《陳夫人》的評論中，對於安子所敘述的「無法抗拒的血的命令」，陳紹馨發出了「難道『血』果真是無法超越的宿命障壁嗎？」³³（頁305）的疑問。陳紹馨提供的解決方策：「必須等待更廣義的象徵性的『血的支配』」理論出現不可」。乍看之下，這樣的鋪陳似乎是被「大東亞共榮圈」原理所回收，但是在做出結論前，陳紹馨以「進化論」的查爾斯·達爾文以及日本奈良時期多種族並存的狀況為例，指出「純血種族極為稀少」（頁305）。陳紹馨此主張與日本人類學者的主張不謀而合，點出自明治時期坪井正五郎等人類學家主張日本人是由複數人種混血而形成的概念。只不過這樣的概念在大正期之後已經轉變成為以基於文化歷史共通性所建構的日本民族概念來取代日本人種概念。因此，陳紹馨的主張對《陳夫人》中的「純血論」主張提出反駁，而且可說是與庄司紘一在「血」的議題解釋權上，針對「人種」與「民族」差異建構的定義，開始了攻防。

而日本優生學的「純血」論述與殖民地同化政策二者之間的矛盾衝突與破綻在台灣皇民文學的文本空間則愈演愈烈。坂口禔子的〈時計草〉中，³⁴山川

32 坂元昌樹，〈日本浪漫派の言説運動——保田與重郎と方法としての〈血統〉〉，《国文学解釈と鑑賞（特集日本浪漫派とその周縁）》（日本東京：至文堂，2002.05）。

33 陳紹馨，〈小説陳夫人第二部あらわれた血の問題〉，《台灣時報》267号（1941.12）。《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学文芸評論集 第四卷》（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1）。

34 坂口禔子，〈時計草〉，《台灣文学》2卷1號（1942.02）。在最初刊登時期，由於檢閱問題，全篇48頁除了46頁以外，全部遭到刪除。河原功監修，星名宏修解說，〈坂口れい子『鄭一家』『曙光』解説〉，《日本植民地精選集37（台灣編12）》（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1.09），頁5。〈時計草〉故事的藍本應是取材自大正年間山地理番警察下山治平與泰雅族瑪烈巴社頭目長女貝克·道雷的策略聯姻。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流轉家族：泰雅族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07）。

玄太郎為了理番政策，與高砂族的女性結婚，並生下了混血兒純。與《陳夫人》同樣地以內台結婚為題材，但是《陳夫人》的中的「內台結婚」是常見的台灣人知識份子男性與日本人女性的結合，³⁵而〈時計草〉中以「理番政策」的策略結婚的設定可看出作者對「霧社事件」的歷史意識。在文本當中，山川玄太郎對純談及因策略結婚的失敗所引起的「霧社事件」的悲劇時，可知作者意圖沖淡因策略婚姻所引起的悲劇記憶。

坂口禰子是受當時優生學論述影響極深的作家，在〈時計草〉之前的〈破壞〉（1940年），以及〈時計草〉之後，描寫移民村的「曙光」（1943年）都有當時優生學說影響的顯著痕跡。³⁶玄太郎將自己的婚姻定位為理蕃政策的一環，並對自己的策略婚姻如此解釋。「對於沒有自己文化者，我必須深入他們內部，捉住他們的手，伸展他們。（中略）唯一可行之道只有將我的血混入他們之中。以我為源頭的子孫在山中人們之間培育文化人，讓他們經營自己的民族」。此處對於「血」的解釋可說是由優生學上「生物性」意義轉換為「文化」意味。而這正是大正時期日本優生學論述中心的翻轉關鍵。意即經由與「血統純正」的日本人同化，無文化的族群也能在文化面向上提昇。而且此處的民族統合手段，與當初日本收編北海道，對於愛奴人以「混血」手段進行同化，在優生學優勝劣敗準則下，導致愛奴「滅種」的同化主張同出一轍。³⁷

當時陳紹馨對於《陳夫人》「純血論」的反駁：「他們所謂的『血』的概念，與其說是生物學上的概念，大部分所指的還不如說是文化性的以及歷史性的概念」，³⁸這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大正期之前日本優生學的定論來

35 台灣日日新報社，〈麗しい内台融和 夫婦揃って歯医者さん〉，《台灣日日新報》，1941.01.05，5面。報導某對日本人男性與台灣女性夫妻的消息時，指出「本島人娶內地女性的人多，然而內地人迎娶本島女性為妻的為少數。由此敘述可知，內台結婚中，以台灣人男性與日本人女性結婚的例子居多。

36 河原功監修，星名宏修解說，〈坂口れい子『鄭一家』『曙光』解説〉，《日本植民地精選集 37（台灣編12）》，頁3。

37 愛奴人滅絕的原因之一，根據愛奴研究專家・文化人類學者小金井良精在1894年所指出的：「愛奴人種的消失，是因為與日本人的關係親密而漸漸形成，並非因為與日本相互傾軋（或與西洋人相爭）而導致的」（《國民新聞》，1894）。轉引自內藤千珠子，《帝国と暗殺》（日本東京：新曜社，2006），頁150。

38 陳紹馨，〈小説陳夫人第二部あらわれた血の問題〉，《台灣時報》267号（1941.12）。《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学文芸評論集 第四卷》。

反論。而這也一語道破了〈時計草〉中玄太郎的「血」的概念之實質構造。

在此文本當中，純的結婚問題特別突顯了「血」的雙重標準以及定義的矛盾。由於有著原住民的血統，純的兩次結婚都因此而失敗。最後，在父親玄太郎的要求下，遠渡父親的故鄉九州，開始準備第三次的結婚。最初相親對象信子拒絕了，但是之後看到了高砂義勇隊英勇事蹟的報導後，改變了心意，對已經答應了與純婚事的錦子提出要求，希望回復與純的婚事。然而，錦子對信子訓誡一番，二者展開了如下的對話：「我不認為那是你的過失。〔那樣的決定〕是你的潔癖使然。是想要保住純正血統的潔癖」「純血？」「……對於純正血統一事，我也想了許多。對於民族血統的純正非得保持下去不可的問題，我也認真考慮過。這不只是由於雜婚所招致血統紊亂的問題。不過，我認為我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也是真實的，而且也必須要有這樣的〔犧牲自我，選擇通婚〕女性才行」（〈時計草〉，頁248-249）。由此段引文可得知，錦子為「實踐皇民之道」的婚姻與玄太郎以理番政策為出發點的策略結婚，是同質性的。信仰「純血論」的同時，為了「同化主義」的大義名分不得不選擇的「雜婚」手段被昇華為「（皇民）之道」。但是只要抱持「純血論」的信仰，種族間的通婚經常充滿矛盾。《陳夫人》以及〈時計草〉都能看出同化政策下日台聯姻關係的緊張。最後，當純認為與錦子的結婚是「後退」時，錦子反駁：「稍稍提高高砂族文化，讓其多少能接近日本傳統難道不是前進的嗎？我一定能夠對你有幫助的」。這段話正應證了玄太郎上述所提出的「沒有文化者，必須深入他們內部，捉住他們的手，伸展他們文化」（〈時計草〉，頁224）的統治政策。「純血論」保障統治者優勢的同時，也成為對「無文化者」救濟的藉口。

而「純血論」以及「同化主義」兩相矛盾的結構本質，在描寫以「日本人」身分認同為目標但始終無法超越「純血論」的台灣人作家的作品當中，我們可見幾近控訴的赤裸裸呈現。對於由上述的「優生學論述」所支持的統治者天生優勢：只要是「純血日本人」便與生具有「日本精神」這樣的差別性構造，台灣人作家則對此抱持懷疑態度。1943年7月陳火泉所創作的〈道〉（《文藝台灣》，1943.07）便是其中一例。以陳火泉本人為藍本的主人公青楠是樟腦

製造會社的技師，是為「純血論」困擾的皇民化世代。青楠在作品當中心醉於日本的古典以及傳統之美，特別是俳聖芭蕉。因為他深信透過深入日本傳統，便能體認日本精神。這樣的主張與當時保田與重郎所主宰的「日本浪漫派」的主張不謀而合，認為要體認日本精神，唯有回歸日本古典。保田主張「論證日本民族的純粹血統所生產藝術的一大根幹，是日本人的使命」。³⁹當時深受德國浪漫派影響，支持當時日本國粹主義論述並成為當時意識形態主流的「日本浪漫派」，其所主張的「日本古典的連續性亦即日本民族的同一性」，對苦於「血」的問題的青楠而言，以「文化純度」超越「生物性血統」的確是解決方案。⁴⁰

青楠對有知遇之恩的股長告白自己的煩惱：「我對日本精神並不願意理解為內地人——也就是日本人所專有的精神」⁴¹（〈道〉，頁38）。這個主張可窺見主人公對於「日本人」＝「日本精神」擁有者的「純血論」論述的懷疑。更進一步地，即使青楠自認為是「優秀的日本人」，「但如果遭遇了攸關死活的問題時，最後關頭自己能否為帝國犧牲，我想還是未定數。」（〈道〉，頁40），直率地吐露對於自己是否能為「帝国」而死抱有極大疑問。對於青楠的這番話，股長「〔認為〕青楠有著不像本島人的銳利直覺。對他的愛惜更增一層，然而一想到日本人以日本人的感覺來切割本島人是如何魯鈍時，不禁覺背脊一涼」（〈道〉，頁40）的反應，正呈現了「純血論」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

但是當青楠不斷地主張精神論將會克服「血」的問題時，股長肆無忌憚地以「上對下的上司口吻」說出「血統問題絕對必須列入考量」（〈道〉，頁44），也因此當沒有實行改姓名的青楠沒有獲得晉升時，青楠說出「菊花是菊花、花得要是櫻花，而牡丹居然就不是花了！！」（〈道〉，頁48）來表示抗議。菊花象徵日本皇室，櫻花則是日本國花，象徵流有漢人血統的牡丹卻進入

39 川津誠，〈日本浪漫派と日本の古典文学〉，《国文学 解釋與鑑賞（特集日本浪漫派とその周縁）》，頁45。

40 在當時的論述中，芭蕉被視為傳承萬葉集以來的「純粹」古典精神，所以青楠鍾情芭蕉其實說明了他對體認「日本精神」的執著。關於皇民化文學與日本浪漫派的思潮受容關係，預定擬稿另述。

41 陳火泉，〈道〉，《文藝台灣》6卷3号（1943.07）。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学台灣作家作品集 第五卷》，（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9.07），以下引文接在文末直接標明篇名及頁數。

不了「花」的行列。這樣的控訴，可說是本島人看穿了殖民地統治層所主張的「純血」論述與同化政策適用的雙重定義與標準。

而青楠也企圖奪回「血」的解釋權：「看著好了，到底血統贏，還是精神勝利，也有『誠意上達天聽』者的」（〈道〉，頁51）。最後，青楠吟出「自認身為日臣民／為無血緣圖傷悲」（〈道〉，頁59）的心情，志願充當台灣陸軍志願兵。乍看之下，這樣的結局似乎落入「皇民化文學」的窠臼，而且為「同化主義」論述所回收，但事實難道不是陳火泉對於支持統治政策的「純血論」充滿矛盾的論理性提出質疑，但最後仍得走上流血乃至獻出生命不可的「皇民之道」過程的告發嗎？

與〈道〉同年同月所發表的王昶雄〈奔流〉（《台灣文學》3卷3號，1943.07），是主人公伊東／朱春生為了完全成為「內地人」，娶日本女性為妻，捨棄「庸俗不堪」的兩親，以成為完全「日本人」為目標的故事。伊東／朱春生在留學日本時，不顧父母的反對，放棄醫科轉入國文科，導致雙親憤而停止援助學費。但他仍堅持苦學，回國後成為國文科教師，卻與雙親形同陌路，這個過程也是全篇故事的主要伏筆。與陳火泉的〈道〉中青楠相同的，伊東／朱春生對於日本古典的執著，可看出回歸日本古典等於回歸日本精神的當時「日本浪漫派」思潮的影響。

全篇伊東／朱春生否認自己台灣人的血，以及意圖切斷自己與台灣所有關係的部分是最值得矚目之處。他一方面與日本人妻子及她的母親同住，另一方面則疏離自己的母親並對她相當冷淡。此外，伊東／朱春生在父親朱良安的葬禮上，相對於身穿「麻衣」的其他家屬，他則身穿「黑色西裝佩帶黑色腕章」，對於遵從台灣葬禮習俗而放聲大哭的女眷，不耐地批判道：「都說了不要這些不入流的習俗」。伊東／朱春生意圖在「文化方面」以及「習慣方面」脫離台灣，而能讓自己更接近「純血」的日本人。在文本中，在敘事者「我」的眼中所看到的伊東／朱春生，雖然才過三三、四歲，但「頭髮的三分之二卻是花白」的，那是「在泥濘戰中留下的痕跡」。由「我」的引文中可得知，那是伊東／朱春生試圖克服「血」的問題而一路苦戰下的結果吧。「我」看了伊

東／朱春生這樣的境遇，「幾乎止不住要哭了出來」。無論如何努力成為「皇民」，自始自終還是無法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因為他的「血統」不純正。想要成為「日本人」也無法達成而使得伊東／朱春生進退兩難的，是圍繞著「血」的論述問題。「我」在文本最後，「再也按耐不住，連聲咒罵著，由山坡上往下奔去」的描寫，正象徵「我」及伊東／朱春生等皇民化世代在「純血論」和「同化政策」論述所製造出的矛盾中遍尋不著出路的苦境。

四、結語

明治維新後、以人種改良為前提的「混合民族論」論述在日本近代優生學初期逐漸形成。之後，日本相繼打敗中國以及俄國兩大國，對於自我民族的優越性有了自信而形成的「單一民族血統論」論述，更在優生學者池田林儀等所鋪陳的優生學概念下，普及至一般民間。但一方面，日本帝國版圖向外擴張，對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同化政策」的一環中，「混合民族論」則成為重要的主張。然而另一方面，在四〇年代之後，德國納粹的「純血」意識形態更強化了當時日本優生學論述「純血論」的主張。這樣的論述變化與日本帝國對外的膨脹擴張以及統治政策考量息息相關。

日本人為複數人種的混血而形成的主張，在正當化其殖民地統治時是極為合宜的。但以大東亞共榮圈為主軸，在東亞多樣多種的人種、民族的混血形成下，卻也正意味著日本人溶解與消失的危機。如當時社會學家小山榮三指出了混血論如何成為當時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危機：「大和民族如果與文化階層比他們下等的諸民族混血的話，不但無法提升他們反而卻會破壞大和民族的統一性，將導致文化水準與他們一樣低下的結果，而變成自我放棄指導者的意識與力量」。⁴² 為維持統治優勢，同時在同時代德國血液純潔的論述影響下，「日本人種／民族」的身分認同便游走於模擬兩可的「純血論」以及「同化政策」的邊緣。

42 坂野徹，〈人種・民族・日本人——戰前日本の人類学と人種概念〉，竹沢泰子編，〈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頁246-249。

而當時「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台灣，皇民時期的文學作品便成為「純血論」及「皇民化」的「同化政策」相互較勁的力學磁場。庄司綏一的《陳夫人》所描寫的「混血」問題不僅反映了當時優生學論述，也透過無法超越「血」的障礙的安子以及身上充滿矛盾的「血」的論述的混血兒清子，呈現當時「純血」論述與殖民地政策二者相克的矛盾。也因此說明了身處“the third place”的安子以及清子仍需在「血統」的優劣序列中尋求定位以確保優位的自我認同。

而坂口禰子的〈時計草〉中，「通婚」「混血」問題被轉變為「教化」手段，由生物學概念轉換成為文化性概念，而教化的責任，也由第一代台日通婚的山川玄太郎傳承至第二代台日通婚的錦子。由上述分析可得知，「純血論」論述毫無疑問地成為前述作品的中心思想。而台灣人作家陳火泉的〈道〉以及王昶雄的〈奔流〉一方面可見受當時日本浪漫派思潮的影響，主人公們所引以為據的日本浪漫派的以古典回歸日本精神（日本民族同一性）論述，在統治者以優生學「純血論」論述的對抗下，雖然慘遭敗北，但透過主人公們爭取「日本人」身分認同所遭遇的挫折正暴露了「大東亞共榮圈」精神性「純血論」以及優生學說「純血論」在同化政策操作上所呈現的破綻以及兩相矛盾。

為了動員，對被殖民者所實施的「同化政策」不僅剝奪了被殖民者的身分認同，更進一步利用「純血論」論述，製造「同化政策」以及「純血論」之間的「差異」。維持統治者優勢的殖民地支配政策內部機制，由在台「日本人作家」以及「台灣人作家」圍繞著「血液」問題的攻防戰中，可說是清楚地呈現其輪廓。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流轉家族：泰雅族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07）
-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台湾人作家作品集 第五卷》（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9）
-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 第四卷》（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1）
- 内藤千珠子，《帝国と暗殺》（日本東京：新曜社，2006）
-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集》（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4）
- 平川佑弘，《和魂洋才の系譜》（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6）
- 福沢諭吉，《福翁百話》（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59）
- 藤野豐，《日本ファシズムと優生思想》（日本京都：かもがわ，1998.04）
- 石塚喜久三，〈纏足の頃〉《芥川賞選集 三》（日本東京：文藝春秋社，1982）
- 市野川容孝，《編成される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2.03）
-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起源の神話》（日本東京：新曜社，2002再版）
- ，《日本人の境界》（日本東京：新曜社，1998）
- 厚生省人口民族部編，《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資料：時下に於ける厚生省研究部人口民族部資料》（日本東京：文生書院，1981-1982）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6）
- 坂口禰子，《鄭一家》（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1）
- 坂元昌樹，《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特集日本浪漫派とその周縁）》（日本東京：至文堂，2002.05）。
- 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日本東京：勁草書房，2005.04）
- 庄司総一，《陳夫人》（日本東京：通文閣，1944）《リバイバル〈外地〉文学選集第二〇巻》（日本東京：大空社，2000）
- ジョージ・モッセ，《大衆の国民化——ナチズムに至る政治シンボルと大衆文化》（日本東京：柏書房，1995）
- 竹沢泰子編，《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日本京都：人文書院，2005）
- 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 昭和篇（上）》（日本東京：田畑書店，2001.10）

- 河原功監修，星名宏修解説，《日本植民地精選集37（台灣編12）》（日本東京：緑蔭書房，2001.09）
- 星名宏修，《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日本東京：東京大 出版会，2002）
- 山内繁雄，《人類の遺伝》（日本東京：大日本学術協会，1917）《性と生殖の人 問題資料集成 優生問題・人口政策編第16巻》（日本東京：不二出版，2000）
- Chung, Yuehtsen Juliette.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二、論文

- 星名宏修，〈「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化期文学」を読む〉，《日本東洋文化論集》7号（2001.03）。
- 星名宏修，莫素微譯，〈「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台灣文學學報》6期（2005.02），頁19-57。
- 陳火泉，〈道〉，《文藝台灣》6卷3号（1943.07）。
- 陳紹馨，〈小説陳夫人第二部あらわれた血の問題〉，《台灣時報》267号（1941.12）。
- 水島水一郎，〈土人娘の胎内よりする民族発展策〉，《優生運動》2卷2号（1926.02）。
- 池田林儀，〈民族根性の擁護〉，《優生運動》3卷5号（1927.04）。

三、報紙文章

- 台灣日日新報社，〈麗しい内台融和 夫婦揃って歯医者さん〉，《台灣日日新報》（1941.01.05），5面
- 谷口虎年，〈大陸日本の進出に登場するこの問題——異人種との結婚と混血児 その結果はどんなものでせう〉，《読売新聞》，1939. 04.24，朝刊5面。
- 岡徹，〈共栄圈内の結婚優生的にどうか〉，《読売新聞》，1940. 10.08，朝刊4面。